



# 弘一大師生母王太夫人忌辰的重大發現及其研究

自林子青先生一九四四年所編《弘一大師年譜》問世以來（以下簡稱「林本」），相繼有一九六九年台灣陳慧劍所著《弘一大師傳》（第二版）後所附大師年譜；（以下簡稱「陳本」。）一九八一年中國佛教協會為「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周年」所編《弘一大師》專集所附大師年譜（以下簡稱「佛本」），以及一九八七年朱經畬所編《弘一大師年譜》（以下簡稱「朱本」），和秦啓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附錄中所刊大師年譜（以下簡稱「秦本」）。綜覽各本，除在文字上稍有出入外，其大致年月都是以林本為範本。所以關於大師生母王太夫人忌辰，除在月份上有分歧外，其年代為一九〇五年卻都是一致的。現分別對各本有關弘一大師生母王太夫人的忌辰記載，按出版時間的早晚比較如下：

劉繼漢

一、林本載：「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大師廿六歲。是年在滬填菩薩蠻二闋憶楊翠喜；又為老妓高翠娥作一絕。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大師以幸福時間已過，即東渡日本留學，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臨行填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革命畫師高劍父為師是時同學。」按，林本以其母為是年去世乃根據豐子愷《法味》一文。他在註（三）中引用豐子愷原文：「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時，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著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

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有四十幾歲！」喪母後的他，自然像游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甚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此文是在大師逝世後，由豐子愷先生回憶所寫，是否有誤，未經大師和第一手資料認可，尙待推究，以此作為大師年譜編寫的依據，從開始即是一個存疑處。

二、陳本載：（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十六歲。四月，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哀痛萬狀，改名李哀，字惜霜。六月，南洋公學畢業，東渡日本，入東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攻西洋油畫，與高劍父同窗。去國前，作「金縷曲」別祖國。入上野，更名李岸，字叔同」。按，陳本基本承襲林本，文字略有增減。

三、佛本載：（一九〇五年乙巳，二十六歲，南洋公學退學後，與許億園、黃炎培等創辦「滬學會」，提倡辦補習班，改良風俗。為補習班撰《祖國歌》，歌頌祖國，一時流行全國。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扶柩回津，易名李哀，字哀公。秋，東渡日本留學，又名岸。到日本後即撰「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說略」，刊於留學生所編之《醒獅》月刊。」按，佛本基本與陳本同，但對王太夫人身後事已有記載，只是未標出處。

四、朱本載：（一九〇五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二十六歲。為滬學會補習科作《祖國歌》：「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

莫比肩。縱橫數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大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嗚呼唯我大國民！」這首歌在滬學會刊物發表後，深受群眾喜愛，並被許多學校採作音樂教材。

三月十日（二月初五）生母王氏逝世於城南草堂。後來叔同回憶說：「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四十幾歲！」他還說：「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見豐子愷的《法味》）。母親故後，運靈回津安葬。易名李哀，字哀公。

是年秋，為求救國之道，東渡日本求學，叔同留學，一說為自費，一說為端方以官費派遣（見鄭逸梅《南社叢談·李叔同傳》），行前填詞《金縷曲》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詞的下片：「……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廳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表達了慷慨激昂的愛國熱忱。

到日本後，首先學習日文。十月，與留日學友商定出刊包括音樂在內的《美術雜誌》。後部分留日學生因抗議日本文部省頒佈《請留學生取締規則》，罷課回國。叔同留在東京，獨自編輯《音樂小雜誌》。

叔同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大改變，剪去髮辮，改為中分式短髮，脫下長袍馬褂，換穿西裝，一變而為風流瀟灑的青年。在這段生活中，諸如早浴、和服、長火鉢，他都嘗試過。他的經濟充裕，生活考究。

是年八月廿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選孫中山為總理，

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留日學生相繼參加者四百餘人。轉年，叔同亦加入同盟會。」按，朱本乃承襲林本、陳本以及佛本所載而略為詳細，亦將王太夫人忌辰定為一九〇五年；仍以豐子愷《法味》一文為依據。但所不同者，朱本確定了王太夫人忌辰為二月初五。

五、秦本載：「一九〇五年，二十六歲。二月，主持滬學會補習班『樂歌課』，將民間曲調《老六板》減慢為四四節拍，配入歌詞，完成樂歌處女作《祖國歌》。高歌『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世界大國民』。由於詞曲貼切，主題鮮明，富有民族特色，全曲歌頌了我幅員遼闊的文明古國，抒發了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因而一經教唱，即由滬學會傳遍滬上，傳遍全國，開創了國人用民族曲調配製樂歌的新風。李叔同也一躍而為與沈心工齊名的樂歌音樂家。」

三月十日，生母王氏四十六歲病逝，即率妻眷護柩返津，舉辦西式喪儀：由吊唁者致悼詞；李叔同彈鋼琴合唱悼歌，舉家服黑衣送葬，一改舊式喪禮繁瑣陳規。

秋季，自喟『幸福時期已過』，易名李哀，安置下妻兒，遂自天津轉赴東京尋求救國之道，寓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丁目三番地集賢館。行前填《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感嘆『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矢志『度群生，那堪心肝剖？是祖國，忍辜負？！』

同季，編配《國學唱歌集》一冊交寄上海出版。所收二十餘首樂歌「上訴古毛詩，下逮昆山曲，或譜以新聲，或仍具舊調」（李叔同《國家唱歌集》序）翌年五月再版，發現不足，函囑友

人「毀版以謝吾過」（李叔同《昨非錄》）。按，秦本除承襲林、陳、佛本所載王太夫人忌辰的年代外，日月依據了朱本所載二月初五日，僅將陰曆轉換成陽曆。但他斷定王太夫人四十六歲病逝，亦就是說，他確定了王太夫人的生辰，這在研究弘一大師生平中可謂是一件大事，歷來包括弘一大師本人都未談及此，不知秦本此說出於何處，尙待進一步攷證。

綜覽各本在一九〇五這一條中，除內容上有增減外，但各本都確定了是年為王太夫人的忌辰，而且因母親之死，自喟「幸福時期已過」，於當年就東渡日本留學。在這一結論上是一致的，毫無異議。過去因對王太夫人的忌辰再沒有見過另外更可確信的依據，所以也確信一九〇五年就是王太夫人的忌辰。但對大師是否真是在同年去日本留學一直存在疑問。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大師天性純孝，且幼年失怙，乃生母王太夫人在艱難的環境中將大師撫養成成人，所以大師對生母王太夫人懷有特殊的感情，而且大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嚴格教育，六歲就學《百孝圖》、《近性篇》、《格言聯璧》、《文選》諸籍。八歲受業於名儒常雲莊，讀《孝經》、《毛詩》，九歲讀《唐詩》、《千家詩》，十歲讀《四子書》、《古文觀止》、十二、三歲略習訓詁《爾雅》，十五歲讀《史記》、《漢書》、兼讀《左傳》。可以這樣說，大師一生處世嚴謹，做事認真，以及以後出家，苦行律學，這和他少年時代飽讀經史詩文是分不開的，一切言行必由圭臬，更何況於孝道上。《論語·學而》云：「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經，喪親章》云：「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

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食而舉之，陳其簞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以「三年無改以父之道」以及「喪不過三年」的古訓，大師怎能在母喪之當年即去國遠遊而未能「示民有終」呢？又怎能馬上改變生活方式，「剪去髮辮，改爲中分式短髮，脫下長袍馬褂，換穿西裝，一變而爲風流瀟灑的青年」而盡情於「生活考究」中呢？這對大師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他怎能在母親剛去世不久，即以所謂「自啣幸福時期已過」爲由，完全宰斷了對生母的無限愛戀和悲哀之情去日本留學呢？這不符合大師的性格。否則在大師五十一歲時怎會在聽靜權法師宣講《地藏菩薩本願經》時「念及亡母，涕淚如雨下」呢？儘管過去有疑問，但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否定這一定論。直到由劉雪陽兄（弘一大師嫡傳弟子劉質平先生哲嗣）贈我一幅弘一大師親書小冊頁，此懸疑才得釋然。因此推翻了所有年譜有關王太太夫人死於一九〇五年的記載，對於年譜中這一段時期內的歷史當重新考證和改寫。這不能不說在研究弘一大師生平事迹中乃一重大發現。

小冊頁爲一長34.6，寬28厘米的硬紙片，大師的手迹即裝裱於此紙片上。手書宣紙的尺寸爲長29.4寬7.7厘米。宣紙的上方用朱筆豎式恭寫「莊敬」兩字，下面用墨筆豎寫「戊辰二月五日母亡二十八周年」，並於每字旁圈一紅圈。另起行亦用墨筆書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在每字旁圈一紅圈）下書「演音敬書」。「莊敬」兩字及所加紅圈疑爲血書（因難以化學分析，僅憑醫院資深化驗員目測）

（見本期封底圖片）

現僅對其內容分析如下。

「莊敬」兩字源出於《論語·爲政》：「臨之以莊，則敬。」意謂爲人處世要莊重嚴肅一絲不苟。大師書此以自勵，實爲紀念母親忌辰也。他寫此字時爲戊辰年二月初五，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是年大師四十九歲，爲生母王太太夫人逝世二十八周年紀念日，那麼以此推算，王太太夫人逝世那年當爲庚子（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那年大師廿一歲。按現存年譜推算，即大師奉母南遷後的第二年。史載：「光緒二十六年三月間（一九〇〇年四月間）英國已派了兵船三艘，美國、法國、意大利各派兵船一艘，開到了大沽口……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六日）夜間，俄英德法意奧日本七國合作以艦隊炮轟大沽口炮台，並且迅速佔領了這些炮台……在大沽口還有七千多的兵力，侵略軍既然得到加強，他們就想立即實行佔領整個天津。這樣就在天津發生了歷時近一個月（五月廿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的激烈戰鬥。」所以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大師不可能在王太太夫人過世的當年就冒險扶柩回津門的，肯定暫厝滬上。朱本和秦本都在一九〇一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中，都記載有：「春，自上海回天津，擬赴河南探視其兄，將行填詞《南浦月》，留別海上同人。抵津後，因道途阻隔，未獲晤其兄。居津半月，仍回上海」。（朱本）。「二月，假道「豫中之行」，北上天津省親，行前填詞《南浦月》留別海上友人。時值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失敗，清政府簽訂《辛丑和約》。迫於道途阻梗，在津留居二月又餘，及返上海，便將此行所作詩詞輯成《辛丑北征淚墨》準備付印」。（秦本）。回津探兄的情節，這倒與史實較爲貼近，疑爲



大師爲扶柩回津而作準備工作，也較貼近大師做事慎重和認真的個性。他必定要親自了解一下沿途實際情況，攷慮在扶柩回津途中要處理的各種事宜；再則要當面與其兄李桐崗商議一下如何進行大殮的事情；但因「道途阻隔，未獲晤其兄」，而未能確定王太太的安葬問題，直到一九〇五年大師扶柩回津後導致因王太太的安葬問題與其兄李桐崗發生了一場公開「鬧的一仗」。這在李端先生（李叔同次子）的回憶中有較詳細的記載：「我祖母的靈柩送回天津以後，我的二伯父（李桐崗）藉口我祖母是外喪，不能進舊宅的大門。爲此我的父親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鬧的一仗。他們兄弟間的公開矛盾，這是第一次。經親友調停說和，才讓我祖母的靈柩進了舊宅，後即擇日舉殯，安葬在新開河邊張興莊以北的李氏祖塋內。……」也正因大師與其兄公開鬧了一仗，才促使大師萌生了「幸福時期已過」的痛苦心情，才會毅然去國遠遊，這應該是事實。

再則從這幅朱書（血書？）朱圈（血圈？）的法書來看，大師是極爲慎重和認真的，既非送人之作，亦非應請之作，完全用以自勉自策的，用以來表達對生母的哀思之情。所以在忌辰的日期上絕無筆誤之嫌。所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源出於《禮·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形容一舉一動都不能離開人們的耳目，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源出《詩經》。《孝經·諸侯章》中加以引用：「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師將兩段話串起來自勉自策，其用意是十分明顯的。癸酉（一九三三年）正月，他在廈門妙釋寺所講「改過實

驗談」（《晚晴老人講演錄》）中這樣說：「二，慎獨。吾等凡有所作所爲，起念動心，佛菩薩乃至鬼神等，無不盡知盡見。若時時作如是想，自不敢胡作非爲。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又引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數語爲餘所常憶念不忘者也」。由此可見，大師嚴於律己的高尚品格以及嚴肅認真的可貴精神是一貫始終的。同時亦證明了大師生母王太太的忌辰肯定是一九〇〇年，準確無誤。

在此我們不能不深深敬懷劉質平先生，是他爲保護弘一大師的遺墨做出了巨大貢獻，爲我們今天研究弘一大師的生平思想方面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實物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位功表青史的傑出人物，只不過是歷史的顛倒而湮沒了他的業績。好在前人的歷史都是後人寫的，歷史自有公論。有人會說，劉質平生作爲弘一大師情深父子的學生爲何在研究弘一大師的生平事迹中沒有留下多少文字？我看這正是劉質平先生的可貴之處，他承襲了大師的真傳，萬種情鍾全在靜默中。而他用生命保存下來的大量弘一大師的遺墨，比甚麼文字言語都能說明問題了。弘一大師有詩云：「姹紫嫣紅不耐霜，繁華一霎過韶光。生平未藉東風力，老去能添晚節香，風裏柔條頻損綠，花中正色自含黃。莫言冷淡無知己，曾有淵明爲舉觴。」質平先生正是秉承了這種「生平未藉東風力，老去能添晚節香」的旨趣做人、生活的。在他歷經了漫漫風雨坎坷人生道路後，默默無聞地離開了人間，沒有顯赫的地位，沒有耀眼的光環，甚至人爲的把他的英名掩沒，但後人怎會忘卻這位爲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做出傑出貢獻的先賢呢？怎能忘卻他爲研究弘一大師生平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呢？我們可以借用弘一大師的詩句來告慰質平先生的在天之靈：「莫言冷淡無知己，曾有淵明爲舉觴。」